

俞吾金：“不怕荒谬”的幸福的追求者

俞吾金今年66岁。

许是巧合，他一生中的许多大事都和“六”有关。

1966年6月，就读于光明中学高三的他，因文革中断了高考梦，此后“考上大学”成了他人生两大愿望之一，而在他30岁后再也没有离开过大学，在大学里继续另一个梦：得天下英才而育之，他对记者说，“什么是幸福？在我看来，一个人的工作正好也是他兴趣所在，这就是幸福”；

1983年6月，发生了轰动哲学界的“六君子”事件。作为“六君子”之一，在哲学研究中的质疑精神和真理追寻，也伴随了他之后的所有岁月，帮助他不断探索学术性和思想性；在给新来研究生的课程上，俞吾金的第一讲就是“在做学术研究时，你们的第一动机应该是追求真理”；从各种荣誉而言，至少有六大被复旦人看来不可逾越的“奇迹”。1987年，从助教破格升为副教授；1993年晋升为正教授并被国务院学位办批准为外国哲学专业博士生导师；1995年，成为全国最年轻的哲学系主任；2005年，被评为教育部首届长江特聘学者；1993年，由他任教练及领队的复旦辩论队在新加坡荣获首届国际华语大专辩论赛团体冠军，蒋昌建获最佳辩手，辩论成为一个时代的时尚和传奇；至今仍是复旦大学30年中在核心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历年之最，在教学、科研上已获得11项省部级以上(含省部级)一等奖；那些并非时空长度就能积累起来的成就，就像一个领跑者激励着复旦学人和天下学子。

也是6月6日，2003年，俞吾金痛失病中爱女。“这是一个痛彻心肺的日子。很长时间，我无法进行思考，处于自责状态……”如今，更多的学生享受着俞吾金导师加慈父般的关爱，而学术更如同他的另一个“女儿”。这段无法抹去的经历，让俞吾金在60岁时写下未全部发表的《耳顺之年话人生》一文，文中回忆了自己五六岁落井溺水的情景，“我在水中挣扎了一会，终于抓住了井壁上的石块，使自己的上半身浮出了水面。我开始高声喊救命……”姐姐碰巧走出门听到深井处的隐约呼叫声。生与死的体验，无法用言语表达的情感，成了在俞吾金生命里独特的体验。

与博学的俞吾金教授交谈，感觉在翻一本散着油墨香的厚厚的书，每一页都是故事，故事里充满知识，知识背后孕育着哲理，哲理背后则是生命丰满的意志与情感。

于是，记者尝试着选取这本书中的几个篇章，和大家一同咀嚼。

学习：学会善于限制自己

俞吾金的记忆力很好，加之博览群书，所以，哪怕和他短暂相处，也会“批发”到些许新鲜的知识。然而，为何钟情于哲学，如何构建自己的知识框架，如何平衡博约矛盾，却也经历了一番探索，其中，又多半由一些书引发和串联。

与哲学一见钟情

1965年，俞吾金在以文科闻名的光明中学读高二，从同学处偶得李致远撰写的小册子《马克思的学习方法》。书中讲述了马克思长年累月在伦敦图书馆里读书，李卜克内西这样评价马克思的博学多智，“马克思的思想就像一艘升火待发的军舰，接到命令后可以驶向任何海域”。形象的描述深深吸引了他，他对哲学产生了强烈的兴趣。他省吃俭用，常到福州路旧书店淘哲学书，列宁的《哲学笔记》、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等，都被似懂非懂地读起来。

1968年9月，俞吾金被分配到上海电力建设公司第一工程处，第一年就被去了四川渡口攀枝花，参加502电站的建设，那里除了《渡口日报》看不到任何报纸，啃着自己带去的《新华字典》，他又攻读起



1978年在复旦大学



2004年，与美国哲学家罗蒂教授合影于《文汇报》报社



1993年，作为教练与复旦大学辩论队合影（左一）



2007年于伦敦马克思图书馆

从朋友处借来的《康熙字典》，从此对小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词语意义和源流的分析，使他日后对英美分析哲学颇有基础和兴趣。

1972年，他在高桥地下热电站施工时，不幸出了工伤事故——右手腕骨裂，被迫在家休息四个月。他便去离家不远的上海图书馆，浏览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对《资本论》留下深刻印象。1973年，俞吾金从工程队调到宣传组，开始了各种文体的创作，也发表了报告文学和小说。

扎根文学书海

1977年，高考恢复，已经工作了9年的俞吾金在女朋友(后来的妻子)鼓励下填报了志愿，他只报了复旦新闻系、中文系、哲学系、历史系四个志愿，然而，当他以40:1的比例被录取在哲学系时却若有所失，感觉是“大门走对，小门走错”。进大学后，他一头扎进文科阅览室，如饥似渴地阅读起外国古典文学名著来，遍读了古希腊三大悲剧诗人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和喜剧之父阿里斯托芬的作品，览尽19世纪外国文学，在复旦借书卡上留下了150本的最高纪录（至今无人打破），“当时如果寝室里同学看的书是自己没看过的，就感觉是奇耻大辱。”回忆起当年的痴狂，俞吾金依然历历在目。他留下了十本笔记本和三部小说。

对于这种“心猿意马”，班主任多次诱导，谈到哲学战线后继乏人的现状，希望他能处理好专业学习和兴趣的关系。他开始反思自己的“平行线战术”。此时，他读了爱克曼的《歌德谈话录》。书中歌德反复强调，一个有造就的人“最大的艺术本领在于懂得限制自己，不旁骛博鹜。”随后他又看到黑格尔在《小逻辑》中，也赞赏歌德的方法，“一个人在特定的环境内，如欲有所成就，必须专注于一事。”

限制自我战略

俞吾金下决心转到哲学主业上，但是，哲学本身也很丰富，经过反复考虑，他决定把兴趣聚焦在外国哲学史。他给自己制定了严格的战略：马哲原理和原著选读、西方哲学史原著选读、英语、世界通史，作为

专业研究的知识结构，而西方美学史、西方伦理史、西方经济史、近代心理学史等等作为“了解领域”的知识储备，同时，他还限制自己，只看对了解外国哲学史有较大帮助的作品，如电影《拿破仑在奥斯特里茨》。另外，他在学一门新课前，总是请教这方面有造诣的老师，以少走弯路。很快，这种由博返约的战略见了成效。当年发表了9篇论文，学业上脱颖而出。1982年考取了本校硕士攻读德国古典哲学，1986年，又师从胡曲园先生攻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士学位。

这样的“自我限制”让俞吾金把专业领域这口井挖得更深。

德国195公斤书

1988年10月至1990年9月，作为联合培养的博士生，俞吾金前往法兰克福大学哲学系留学，这两年，在体会柏林墙倒塌中研习德国古典哲学外，法兰克福市内大大小小的书摊让他过足了购书瘾，学校旁边的卡尔·马克思书店内，他断断续续买了七百多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谢林、叔本华、阿多诺、霍克海默、维特根斯坦、恩斯特·布洛赫等重要的哲学家，都买了全集，而笛卡尔、尼采、齐美尔、德里达、福柯、胡塞尔、海德格尔、哈贝马斯、马尔库塞、伽达默尔等，也买了主要的著作。如同当年初进复旦文科阅览室，俞吾金内心的痴狂在异国他乡再一次得到满足，有趣的是，临上飞机前，他打包了39箱书，整整195公斤。不仅付了很多托运费，还被一位留学生揶揄：“老俞，你简直是在掠夺德国文化。”

对知识的渴望，对书的拥有欲，常常如同魔鬼靡菲斯特般缠绕着几代学人，让他们不能自己。尤其是被文革耽误了学习的那代人。俞吾金也不例外。

28年著书25本

而1988年，他已经出版了两本自己的两本著作：《思考与超越：哲学对话录》和《问题域外的问题：现代西方哲学方法论探要》，而顺着给“限制自我”的

战略，在之后的26年中，他又出版了《意识形态论》、《从康德到马克思》、《重新理解马克思》《问题域的转换：对马克思和黑格尔关系的当代解读》等等。

在记者看来，“限制自我”是俞吾金各类传奇中的第一秘诀。

学术：第一动机当追求真理

初识俞吾金的人，恐怕都不会反对用“温良恭俭让”一词来概括对他的印象，其实，比起隐含在爱书读书背后的痴狂，在学术研究中，质疑精神和创新意识的坚持彰显了俞吾金执着的一面。而这和两段经历密切相关。

质疑林彪的观点遭围攻

1966年6月，俞吾金留在光明中学参加“文化大革命”。班里学习《毛主席语录》，他对林彪在“再版前言”中把毛泽东思想比喻为“顶峰”感到困惑不解：任何真理都是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的统一。所谓“顶峰”也就是没有发展了，这怎么可能？他在小组讨论会上说出了自己的困惑，结果，工作组得到小报告突然组织全班同学开讨论会，指责其对待毛泽东思想上“有观点问题”，有人甚至试图把他打成反革命。只有17岁的俞吾金心里非常苦闷：为何真诚地提出疑问、追求真理，却遭到了这样的围攻？从此变得沉默了，成了逍遥派。

参与“六君子”事件

这段最初的质疑让他远离了哲学，以至考入哲学系都有些怨恨。当他把精力集中到哲学并跟随读尹大贻攻读德国古典哲学硕士学位时，又一件事发生了。

主张密切关注现实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并积极参与哲学基础理论的探索的他，和正在读博的谢遐龄及硕士同学吴晓明，对当时学界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深为不满，六人商议后共同起草了一份《关于认识论改革提纲》，提出了系统的批评。

1983年6月，在广西桂林举行“现代科学技术和认识论”全国性学术研讨会上，六人宣读了这份《提纲》，当即受到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萧前的批评，与会者很快分裂成两大派。年龄较大而思想保守的学者站在传统教科书体系的代表一边，而年轻的学者则站在六人一边。当时全国范围内正在批判所谓“精神污染”，中宣部闻讯立即下达文件，批评《提纲》全面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并要查六人的背景，也有人甚至扬言要开除六人的学籍。

回到复旦，校党委组织了六人的学习班，此事在哲学界被同情者称为“六君子事件”。按照当时的舆论，六人毕业后都不可能留在复旦了，俞吾金联系上去上海市人民出版社哲学编辑室。

“哲学与改革”讲座爆满

然而，由于胡耀邦出来工作，改革开放的形势进一步明朗。1984年底，俞吾金完成了题为《黑格尔的理性概念》的硕士论文，六人干脆又联络了系里的其他博士生和硕士生，在复旦大学最具历史文化意义的3108教室举行了“哲学与改革系列演讲”。前后15讲，历时一个月，场场爆满，听众里三层外三层地把整个教室围得水泄不通，甚至连窗台上、讲台周围都站满了人。《文汇报》、《人民日报》、新华社报道了盛况。六人还联名在这些报刊上发表了《经济体制改革与破除‘观念’崇拜》、《略论哲学改革中的若干问题》、《论学术自由》等论文。不久，学校里表示六人全都可以留校。俞吾金被分配到现代外国哲学教研室。

(下转第3版)